

靠哪边站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4年1月5日

意本郑经当有事情发生时，大至种族暴动，小至朋友争吵，我们时时都被要求（或自我要求）选择要靠哪边站，而往往这一站就总结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情感与文化认同。小印度发生骚乱当晚我刚好在国外，隔天友人电邮提及才知道。当时除震惊之外，想起当年上社会人类学课有关族群冲突的辩论。

辩论一方从心理学立论认为，种族冲突源起自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种族差异性。人们的焦虑感来自于对他族文化不同的恐惧。这一派学者认为，无论是通过学校教育或社会约定俗成的社会认可行为，都无法消除人们对他族背景与文化与自己不同的恐惧与焦虑。另一方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原始种族特征无法完全解释突如其来的种族冲突，并认为人们的恐惧与焦虑是受到政治家（或利益相关者）有目的的操纵和煽动。

小印度事件经初步调查已经排除后者的可能性。从后续报道看来，大部分国人并不认为这起事件直指种族冲突，更多认为是客工的处境问题。由于骚乱现场是某一族群的惯常聚集地，牵涉的也多属于这一族群的人，大多数国人并没有因此一竹竿以种族文化与行为解读事件，是值得庆幸的。这里只是想借题发挥把事件当作一个契机，探讨一下在公共空间发生争执时靠哪边站的问题。

种族身份与文化的挂钩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常被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你是什么族群的人，一般就会呈现这个族群公认拥有的文化特质和行为。随着全球化人口移动及移民成潮后，这样的链接不再成立，举例说明，即黄皮肤黑眼睛的华族人士未必就呈现传统的华族文化价值观与行为特征。然而，趋势转化为社会思想需要经过一段颇长的时间，因此无可避免的，一些人仍然会依据原始种族特征如肤色，以及其他文化特征如行为、习俗等来归纳他人的身份。

若依据之前提到的心理学家们的看法，无论政策和社会公认行为如何健全，人们对不同族群的文化和行为差异仍然存有焦虑和不安。当有事情发生时，大至种族暴动，小至朋友争吵，我们时时都被要求（或自我要求）选择要靠哪边站，而往往这一站就总结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情感与文化认同。虽然之间会有挣扎纠葛，一旦靠边站的最大依据是种族身份，而其他因素都相对弱势的话，那种族纠纷就容易发生。小印度的骚乱事件，种族因素固然明显，但因为牵涉的多是客工，因此职业与客工身份的因素更强。再者，一般国人正面接触客工的机会不多，情感与文化相对都属弱势因素。

人类学在这个方面所能贡献的，就是强调个人经验的部分，与较关心宏观环境与因素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学说起着相辅的作用。其所强调的是，在制订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的族群生活环境与政策之外，还需要时时关注这些建设与政策实施的人本因素。条例列明各大族群都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每日处事的过程中，政策所保障的公正公平是否都能体现出来？政策理念提倡的求同存异是否具有实践意义？

新加坡对于族群的划分自建国以来都依据 CMIO (Chinese, Malay, Indian and Others, 即华巫印与其他) 模式，并以此制订政策及规划管理，如政府组屋配额制和族群自助会都依据这个模式制订，以图做到资源公平分配，各族群得到同等尊重。但与此同时，CMIO 的模式也不时提醒国人彼此的差异性，强化族群特征的链接。另一方面，为了不凸显任何一个族群及其文化，最明显的政策就是鼓励不同族群人士以英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致使非英语使用者的社会地位

较低，若公开推崇自族语言文化，则容易被误解为不顾他群的文化斗士。这样的结果是，大家虽然都看到彼此的存在，但交往过程中都避忌交流族群文化与思想，大家协力求同，虽然也都能存异，却也没有积极消除存疑，而是各自守护并推广文化堡垒，尽量不去“侵犯”到别人。文化撞击及相互了解的门不是没有，但就不够宽广。

公共空间其实是让各族群磨合交流的最佳场所。要消除对彼此文化与行为上的不安与焦虑，别无他法，就是促进交流与了解。许多国人对于非我族群的认识一般上不算深，对异族的节日、习俗、生活习惯、思想模式或许都有粗浅的认识，却也同时存在一些偏差观念。这些偏差认识在有事件发生时就会浮现，小印度骚乱事件也引发一些这样的言论流传于互联网上。

要维持社会和谐族群和睦共处，不是将彼此的差异隐藏起来。这次小印度骚乱反映了国人具有一定的成熟度，或许我们可以放宽文化撞击的门槛，鼓励在共有空间多些文化撞击，尽量消除“你兴我就会败”的二分角力暗涌。小处的文化撞击，其实是为了在大处相互尊敬做好准备。

作者是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Please click [here](#) for English version